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

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

1994 2

ISSN 1002-6800



05>

9 771002 680002

中国
边
疆
史
地
研
究

季刊
(Quarter)

1994 年第 2 期
(总第 12 期)

主 编 邢玉林
Chief Editor Xing Yulin
执行编辑 刘 逊
Editor Liu Di

目录英译 刘存宽

封面题字 启 功
封面设计 冯光美

1994 年 4 月出版

目 录

学者论坛

- 近代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黄鸿钊(1)
交河郡夫人墓·高昌·吐鲁番——兼述高昌
与中原的关系…… 孙永乐(13)
西域史地研究与《坎曼尔诗笺》的真伪…… 杨 镰(20)
从明末台湾看大陆对台湾社会演进之影响…… 周文顺(30)
策妄阿拉布坦对天山南路的征服与统治…… 刘正寅(38)
清政府对库页费雅喀人的辖治及有关问题…… 王德厚(46)
新疆昌吉地区清末民初商业概述…… 戴良佐(53)

探索与交流

- 俺答汗等生卒年考…… 杨绍猷(57)
东北亚民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方 衍(65)
国际会审法庭—19 世纪下半叶调解俄中关系
的新形式…… [哈]K. III. 哈费佐娃 著
阿拉腾奥其尔 译(69)

当代边疆纵横谈

- 论南海国际文化旅游圈…… 王路平 宋太庆(82)

学者介绍

- 硕果累累的边疆研究者吴丰培教授…… 边 师(88)

研究综述

- 伯克制度研究综述…… 苗普生(93)

文献之窗

- 中国边疆资料东瀛寻访琐记…… 马大正(108)
1993 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文目录(二)…… 寇俊敏(114)



22182389

Contents

Forum

-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Modern Macao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uang Hongzhao(1)
- Madame Jiaohe Prefecture's Tomb - Gaochang - Turfan, and Some Concurrent
Not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aochang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 Sun Yongle(13)
- Western Regions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and the Reliability of
"Connotations on Kamar's (坎曼尔) Poems" Yang Lian(20)
- Chinese Mainland's Influence over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te Ming Taiwan Zhou Wenshun(30)
- The Conquest and Rule of the Region South of Tianshan by
Tseben Raptan Liu Zhengyin(38)
- Qing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upon Sakhalin Feiyakas and other
Questions Concerned Wang Dehou(46)
- An Outline Narrative of the Commerce in Changji Region, Xinjiang,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 Dai Liangzuo(53)

Inquiries and Exchanges

- A Study of Altan Khan's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 Yang Shaoyou(57)
-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North - East Asian Nationalities
..... Fang Yan(65)
- International Joint Court - A New Form of Regulating Russo - 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Kazakhstan) K. Sh. Khafizova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N. Altan - Ochir(69)

Free Talk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Borderland

- On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Cultural and Tourist Circles
..... Wang Luping Song Taiqing(82)
- Who's Who in Academic Circles
- Professor Wu Fengpei - A Chinese Borderland Researcher of Many
Achievements Bian Shi(88)

Academic Summary

- A Summary of the Studies of the Bek System Miao Pusheng(93)

Literature Window

- Scraps of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Materials of Chinese Borderland
Collected in Japan Ma Dazheng(108)
- Catalogue of Articles on Chinese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1993(II) Kou Junmin(114)

近代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黄 鸿 钊

近代中国同西方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葡人东来,居留澳门开始的。澳门弹丸之地,本是荒辟渔岛,葡人到来后,“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赏,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西洋货物源源输入,西方文化不断引进,使澳门很快成为国际贸易港口和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澳门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今天,我们阐明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桥梁的作用,仍然颇有意义。

一、葡人东来与中西文化的接触

1、葡人东来拉开文化交流的序幕

近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始于中葡关系。当葡人东来的时候,西方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资本主义的产生,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发展、思想活跃、文化繁荣、观念更新,使西方文化登上一个新台阶,在世界上开始领先于停滞不前的东方文化。在这种情况下,1517年葡萄牙商业舰队到达广州地区,占居屯门岛(今香港新界)。作为西方文化的第一个代表,他们给中国带来两份“见面礼”,即天主教和佛郎机铳。

2、澳门在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1553年~1557年间,葡人居澳门。从此,澳门不仅是个通达海外的贸易港口,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这种特殊地位的形成,是由各种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澳门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它位于珠江三角洲最南端,北连大陆,南面汪洋,是广州出海的天然门户。澳门与内地水陆相通,联系密切。纵横交错的珠江水系,使澳门与三角洲之间的内河航运十分发达。同时澳门地处南海之滨,沿海岸线东行,可以沟通闽浙沿海港口,西行则与雷州、海南和广西沿海港口相通。早在开埠初期,闽浙商人就聚集澳门,与广东人一起谋生。“其通事多漳(州)、泉(州)、宁(波)、绍(兴)、及东莞、新会人为之。椎髻环耳,效蕃衣服声音”^①。“其商僧传译、买办、诸杂色人多闽产,若工匠、若贩夫、店户、则多粤人”^②。“而大蠹则在闽商,其聚会于粤,以澳门为利者,亦不下数万人,凡私货通夷,勾引作歹,皆此辈为之”^③。可见澳门对东南沿海各省商人吸引力之大。

从对外交通来看,澳门南面汪洋,国际航路通畅,不但与日本和菲律宾等东亚国家相通,还可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可到达东南亚和南洋各国,直抵非洲东岸。再沿好望角北上,通往欧洲。在这漫长的贸易线上,先后有欧亚非洲大约十多个古代国家的商人到过澳门,其中有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非洲东部的索马里

① 庞尚鹏:《百可亭摘稿》(明刊本),卷一。

②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上卷形势篇,页2。

③ 史澄:《广州府志》(清光绪5年修),《列传》11。

以及亚洲的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印尼群岛、马来半岛、中印半岛、菲律宾群岛和日本群岛的古代国家^①的商人。

澳门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利于贸易的发展与文化的交流,葡萄牙人东来以后,利用澳门港在东方从事转运贸易。每年葡萄牙商人的大帆船队从里斯本启航前往东方,总是先到印度果阿,再经柯钦到马六甲、小巽他群岛(帝汶)而到澳门。然后分头至广州,至长崎,至马尼拉,往来贩运货物,从事贸易,归后船队在澳门集中,启程回国。这样一来,澳门便成了国际贸易中的转运站。通过贸易的发展自然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第二,鸦片战争以前几百年间,由于中国奉行闭关政策,对朝贡贸易有种种禁令和限制,澳门以其特殊地位垄断了中国对外贸易,成为中外贸易的总汇之区。明朝厉行海禁,除了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官方贸易之外,一概禁止私人从事海外贸易。这一禁令虽然时紧时松,但海禁的基本原则没有变。1522年起,明朝更罢闽浙二市舶司,封闭泉州和宁波二港口,只剩下广州市舶司。而广州口岸的贸易又以朝贡贸易为主。澳门港的贸易不属于朝贡贸易性质,各国商人可以在这里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购销活动。明朝和清朝政府对澳门的贸易一般采取宽容政策,没有过多的限制与干预。清朝初年海禁甚严。1661年,清政府颁布迁海令,规定沿海居民内迁30至40里,筑边墙为界,不许逾越一步。澳门位于滨海地区,按规定亦在迁移之列,但清政府仍允许葡人继续居留和贸易。中国政府这种对沿海各省禁令甚严,而对澳门另眼相视,特别优待的政策,造成了中外贸易长期被澳门垄断的局面。澳门“在中国人的监督下,变成各国与广州间贸易的基地”^②。“它是葡萄牙人进行商业活动的基地,也是一切外国商人不分彼此,共同参加的大部分走私活动的基地”^③。基地的作用还表现在:“各国夷商来澳贸易,货船俱进黄埔,而坐在商伙多僦居澳门,探行市,清帐目固在此,而操奇赢,通诡秘亦在此,是澳门实为总汇之区”^④。因此,西方的商品与文化总是通过澳门进入中国。

第三,在鸦片战争以前,澳门又是唯一的外国人居留地,葡人东来目的是从事贸易,谋取财富。但他们居留澳门,生息繁殖,也带来了西方生活方式:住洋房、着洋服、吃西餐、执洋礼、说洋话、写洋文,以及开办教堂、学校和医院等等。这一切使得澳门成为一座西洋文化气味很浓的小城。

当时的中国人用惊讶的眼光注视着澳门这座西方化城市的出现,葡人入居澳门不久,便有个官员的奏稿这样写道:“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夷众殆万人矣。诡形异服,剑芒火炮,弥满山海,喜则人而怒则兽,其素性然也”^⑤。万历年间,汤显祖贬官徐闻,途经广州地区,特地绕道访问澳门,看见一派奇特风光,大为感叹。口占一诗,写道: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诸蕃贡物》。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7年),第一卷,页50。

③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页42。

④ 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页14。

⑤ 庞尚鹏:同前引书。

不住田无不树桑,峨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①。

当时华洋杂居的澳门,人口已有几千人口甚至万人以上。这当中,有时华人多于洋人,有时洋人多于华人。例如1563年澳门居民总数为5千人,其中中华人为4.1千人,葡人为900人。1743年居民总数为5.5千人,其中葡人为3.5千人,华人为2千人。1839年居民总数1.26万人,其中中华人为7.3千人。葡人为5.6千人,另有英国人57户。1844年居民总数8.9千人,华人为4.9千人,葡人为4千人。澳门华人基本上按中国传统方式生活,但与洋人相处日久,渐受潜移默化之影响,从而穿洋服、习洋文、进洋学堂、信奉洋教,乃至出洋留学,学习西洋科学知识,颇不乏其人。而澳门洋人穿汉服、习汉语、研究汉学,翻译典籍等等也屡见不鲜,华洋通婚的事亦时有发生,几百年间,澳门混血种人数以千百计。可见,澳门提供了充分条件,使中西文化相互渗透与融合,逐渐形成别具一格的澳门文化。

总之,由于上述种种条件造成澳门在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我们今天应当还它本来的历史地位,给它以充分的评价。尤其是研究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只有同澳门联系起来加以深入考察,才能真正弄清这种交流的来龙去脉。

二、天主教远东传教的开始

1. 澳门教堂的建造与教区的成立

关于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人们已写了许多著作。这里主要想阐明澳门与基督教传入的关系,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与西方文化传入的关系。

葡萄牙人于1553年开始进入澳门。大约在1553年或1554年间,便有耶稣会士巴莱多(M. N. Barreto)来到澳门活动,此人同时也到过浪白澳,并于1553年8月在该处建草屋数间作为传教之用^②。澳门的传教则稍迟。至1562年澳门建立了3座简陋的教堂,即望德圣母堂(中国称疯王堂)、圣安多尼堂(花王堂)和圣多楞佐堂(风顺堂)。共有天主教教徒约600人,隶属于马六甲教区。1566年至1569年间,教会在澳门创建麻风院、仁慈堂和白马行医院(俗称医人庙)。这是教会为了吸引信徒而从事的最初的慈善事业。1567年1月23日,罗马教皇颁布谕旨,成立澳门教区,任命耶稣会士加内罗(D. Melchior carneiro S. J.)为第一任主教,负责远东地区的传教事务。加内罗于1568年到达澳门,积极推动对华传教事务。他曾两次前往广州,请求广东当局允许开办教堂。但广东政府认为葡萄牙人有扩张野心,一再拒绝批准。加内罗鉴于一时无法向中国内地传教,就集中精力经营澳门教务,首先从慈善事业入手,开设了一座医院,不论是否教徒,均予收容治病。从而沟通了教会与民众的关系。此后澳门的教堂愈建愈多,规模也愈造愈大,其中最宏伟的一所教堂为圣保禄教堂(中国人称为三巴寺)。该堂始建于1563年,分修道院与教堂两部分,由五座相互连接的建筑物组成,全部建筑费用达3万银元之多,每当举行宗教仪式,参加礼拜者约达300人,故成为遐迩闻名的远东教区大本营。凡澳门的耶稣会士,皆被称为三巴寺僧,当时流居澳门的迹删和尚方颢恺咏‘澳门诗’中,有“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之

① 汤显祖:《汤显祖集》,“诗文集卷十一·玉敬堂诗之六”。

② 方豪:《中国交通史》,页685。

句^①。可见圣保禄教堂教士与信徒之多。

到了80年代,由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努力,对中国内地的传教才开始打开局面,先后在中国内地的肇庆、韶州、南雄、南昌、南京和北京设立了教堂,吸收了大批中国教徒入教。而他的全部传教工作均是以澳门为基地进行的,他于1580年到达澳门,寓居三巴寺,学习中文,研讨传教方法,作好传教的种种准备工作。他的传教计划得到澳门葡人全力支持,给他提供充足的活动经费,以及贿赂中国官员和朝贡所需的礼物。澳门教区是他传教工作的后盾和物质保证,如果没有澳门教区的存在,利玛窦的传教工作不可能取得成功,他的先驱沙勿略的失败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

2. 澳门天主教中的中国信徒

经过西洋传教士的一番努力,明末清初大约一百年间,天主教以澳门为基地的传教活动有了一定的发展。葡人控制下的澳门教区以利玛窦为中国教会会长,一切传教事宜均听从这位成功的开拓者的指挥。中国内地肇庆、韶州、南雄、南昌、南京、北京都分别设立教堂。清朝初年杨光先在《请诛邪教状》中说,有30所大教堂分布于全国大中城市,全国天主教徒达15万左右。作为传教基地的澳门有教徒“盈万人”,其中华人信徒是在一所专门教堂举行宗教仪式,这所教堂附属于三巴寺,是耶稣会士范礼安于1578年建造的,专门吸收华人入教,由三巴寺教士负责管理,并用华语传教。中国人称之为唐人庙。1746年澳门同知张汝霖对该庙全面调查,写了奏章,详尽报告了中國人在澳门入教的情况:

其唐人进教者,约有二种:一系在澳进教,一系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其在澳进教者,久居澳地,渐染已深,语言习尚,渐化为夷。但其中亦有数等,或变服而入其教,或入教而不变更,或娶鬼女而长子孙,或藉资本而营贸易,或为工匠,或为兵役。又有来往夷人之家,但打鬼牌,亦欲自附于进教之列,以便与夷人交往者。此种倏往倏来,不能查其姓名。今查得林先生,周世廉一十九人。而林先生署名叭吠叭吵,住进教寺内,率其子与其徒,专以传教为事。周世廉署名安哆弥咽也,又呼卖鸡周,俨然夷船之主,出洋贸易,娶妻生子。此二人,尤为在澳进教之魁也。

其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者,缘澳门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为进教寺,专为唐人进教之所,向系林先生住居其中,以行医为名,实为传教。每年清明前十日,各持斋四十九日,名曰封斋。至冬至日为礼拜之期,附近南、番、东、顺、新、香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惟顺德县紫泥人为最多。礼拜之后,有即行返棹者,有留连二三日者,既经进教,其平时因事至澳,亦必入寺礼拜,一地进教之人,俱向林先生取经诵习^②。

由此可见,澳门教区实际上直接管理着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和香山等县的宗教事务,华人受洗入教后,不但在澳门积极参予传教活动,还常常陪同西洋教士进入内地传教,充当洋教士的向导和翻译,如广东新会人钟鸣仁、钟鸣礼兄弟同其父一起在澳门入教后,曾伴随利玛窦、罗明坚、王丰肃、郭居静传教于广东、江西、江苏和浙江等地,又居住北京传教六七年之久。

①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澳蕃篇”,页63。

② 印光任等:同前引书,页29~32。

3. 澳门充当传教士庇护所的作用

当天主教在中国内地传教活动遭到挫折的时候,澳门教区又成为传教士的庇护所。

早在天主教刚刚在中国开始传教活动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加以反对,他们指出,天主教包藏侵略中国的祸心,必须严令禁止。明朝于1616年(万历44年)颁布禁教令,南京查封教堂,驱逐教士出境。这一事件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的活动。耶稣会士从各地回到澳门,重新研究活动计划。不久以后,许多教士分别乔装打扮,改名换姓,潜入内地继续偷偷摸摸地进行传教活动。后来禁令稍缓,天主教又发展起来。

清初政府采取宽容政策,康熙皇帝曾经重用过一批传教士,可是后来由于发生“礼仪之争”,1720年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于是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又遭受挫折。教士们纷纷被内地驱赶,又返回澳门静观形势变化,伺机而动。

但康熙以后,雍正也实行了禁教政策,采纳了浙闽总督满宝于1723年的奏折:“西洋在各省起天主堂行教,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天主教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飭”^①。这样一来,便明确规定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限制在澳门之内。

乾隆之世,禁令更加严厉。中国政府三令五申,规定澳门的传教士只允许在外国人中进行宗教活动,不许向澳门的中国居民传教。

1744年澳门同知印光任向省府报告称:“澳门民夷杂处,致有奸民潜入其教,并违犯禁令之人窜匿潜藏。宜设法查禁,听海防衙门出示晓谕,凡贸易民人悉在澳门墙外空地搭蓬市卖,毋许私人澳内,并不许携带妻室入澳。责令县丞编立保甲,细加查察。其从前潜入夷教民人,并窜匿在澳者,勒限一年,准其首报回籍”^②。省府根据印光任的报告,明令禁止澳门教堂吸引中国居民入教。

1746年,根据澳门同知张汝霖奏报,广东政府决定查封澳门唐人庙。“将进教寺飭令地方官督令该夷目严加封锢看守,不许擅开。倘有奸民仍敢勾引内地民人复踵前辙者,立即严拿治罪。”“唐人庙”被查封,对于澳门教会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至1749年,香山县拟定澳门治安条例刻石颁布。其中第十二条规定:“禁设教从教,澳夷原属教门,多习于天主教,但不许招授华人勾引入教,至为人心风俗之害,该夷保甲,务须逐户查禁,毋许华人擅入天主教,按季取结,缴送。倘敢故违设教从教,与保甲夷目一并究处,分别驱逐出澳。”这样一来,教士们在澳门向华人传教也被取缔了。禁教令一直延续至鸦片战争期间。由于禁令时紧时松,贯彻不力,澳门传教士仍在秘密传教。据1810年统计,有欧籍教士31人在中国内地16个省秘密活动。招收教徒25.5万人。到1839年6月教徒估计达30万人。而澳门在1830年估计有6090名中国教徒,其中有7名中国神父。

三、西学与中学的早期交流

1. 传教与引进西学的关系

澳门教区建立以后,便在澳门办学校,开医院,行赈济,以此笼络华人,树立天主教的

^① 《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第12卷,页41~42。

^② 印光任等:同前引书,页28。

济世救民的良好形象,把群众吸引到教会周围,以利传教。到了16世纪80年代,澳门教区在派遣教士进入内地传教时,策划了一套学术传教的方针,报经罗马教廷批准,由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实施。耶稣会士是罗马教廷精心选拔的传教骨干,他们到东方之前都受到耶稣会院校良好的“英才”教育。耶稣会的目的“不是培养知识英才,而是培养具有英才的基督徒”^①。这些教士有大学学历,既是不屈不挠的传教士又是博学多才的学者。他们来华的目的是传教,是充当“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个崇拜偶像的中国”^②。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使用的手法则因地制宜。用基督教神学家的话来说:“天主圣神给与各人的神恩,是各不同的。但是为一地方开教,天主上智的安排,也各有不同,圣方济各·沙勿略地印度开教,劝化十多国,授洗数十千;天主上智的安排的方法,是令圣人多行灵异之迹,使印度诸国人民,合群于诸信者之栈。利玛窦在中国开教,天主上智所用的方法,是学问,使利公用天文地理算术等等科学,兴起华人研究之心,使华人由本性的学问上,得获性的学问”^③。

16世纪50年代沙勿略来华时,便抱有学术传教的思想,因其意外死亡,未能实行。直到80年代,利玛窦等人才认真执行这一方针。1583年利玛窦来到肇庆,贿赂太守王泮,获准建造教堂。他并不急于传教,不妄劝人崇奉,而是举办欧洲文化展览,将澳门教区提供的各种奇巧物品,如自鸣钟、天文仪器、地图、三棱镜、洋装书籍等陈列满室,供人观赏。许多人出于好奇心,纷纷前来拜访洋和尚,参观西方奇器,询问西洋文物制度和风俗习惯。利玛窦在当地的官吏豪绅文人学士中广交朋友,又采纳了韶州太守瞿太素的劝告,由穿僧服改穿儒服,一副儒生打扮,被称为西儒。利玛窦同中国士大夫讨论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专门学问,以他渊博的学识和高雅的谈吐,使许多人信服西方科学,接受天主教义,领洗入教。然后,这些有知识的新教徒又大力宣传教义,遂使天主教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

由此可见,早期到中国的某些耶稣会士具有双重身分,他们既是传布天主福音的教士,又是引进西学的文化使者,近代西学的传人与中学的西传,便是一大批这样的传教士起着先导作用的结果。今天我们探讨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问题,决不能抹煞他们的历史功绩。而这些传教士又是在澳门教区的具体组织和派遣之下从事活动的。

2. 培养汉学家与西学人才的学校

澳门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把许多西方人培训为中国通,使之有可能成为汉学家,同时又把许多中国人培训为通晓西学的人才,承担这种培训使命的圣保禄神学院,可以说是培养汉学家和西学人才的摇篮。

圣保禄神学院原是一个简陋的修道所,至1594年12月1日扩展为神学院,又称圣保禄学院(Colegio Sao Paulo)。它在圣保禄教堂之侧,中国人通常把两者合称为三巴寺。它是远东第一所教会学校。至1835年被大火焚毁为止,共存在241年之久。学院的经费由澳门葡商负担。课程分为三类:一、人文科——汉语、拉丁语、修辞学、音乐;二、哲学科——哲学、神学;三、自然科——数学、天文、历算、物理学、医药学等。其中汉语为必修课程,课时

① 埃德蒙·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页69。

② 裴化行:《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东方文艺社,1943年),第1册页1~3。

③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页328。

也最多。学生来源主要两个方面,一是欧洲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目的是培养他们成为精通汉语,熟识中国国情,风俗与礼仪的人才,以便进入内地传教。二是中国和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教徒,目的是使他们精通拉丁文和天主教义,通过培训后可能加传教工作,以后并可晋升司铎。尽管这所教会学校是为了推广天主教而创办的,但他的实际意义大大超出了宗教范围。大体上说,洋人进修2年是接受汉文化的过程,而华人进修2年则是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

1567年至1807年间,先后到圣保禄学院(包括学院的前身修道所)进修的西方教士约有200多人,其中有许多人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他们在传教过程中把大量西方宗教与科技黄籍译成中文,传入中国;同时他们也成了中国通,把一些中国古代典籍译成西文,传入欧洲,并撰写了一些介绍与研究中国的著作,成为早期有影响的汉学家。

同一时期在圣保禄学院进修的中国教徒的数量究竟多少,目前尚无确切的统计,但确有中国教徒在这里进修。教会培养中国教士着重从娃娃抓起,因此学院中年人的比重少于儿童。同时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国内和国外均有,语言文字互不相同,都是在“学道”的前提下聚集一起的。他们每天听到上课铃声,便到教室学习二个小时。

华人学员进修后,懂得了天主教义,掌握了外语和一定的西方科学知识,成了西学人才。他们从事传教事务之余,也翻译和撰写了一些著作,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了一些事情。如游文辉、徐必登曾参与制作《两仪玄览图》,陆希言(陆希贤)著有《圣年主保单》二卷,《亿说》一卷,《周年主日口译钞本》二卷,以及《澳门记》等。吴历是清初著名诗人和画家,著有《墨井诗钞》、《三巴集·澳中杂咏》等。游文辉之西画,他绘制的利玛窦像,珍藏于罗马教廷之中。石宏基也是个画家,画了许多宗教宣传画。

1835年,圣保禄学院和教堂同时遭大火焚毁,被迫停办。几年以后,澳门出现了另一所新型的西式学堂。这所新学堂是为纪念著名教士马礼逊(Robert Moilison)而开办的。马礼逊是利玛窦以来基督教另一著名传教士。利氏是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开拓者,而马氏则是新教派在华传教的奠基人,并且是基督教被禁止100多年后,重新恢复传教活动的第一人。他从小便有到外国传教的志向。当伦敦传道会询问他到哪里传教时,他选择了中国,并找到一个名叫杨善达的广东人做教师,开始学习中国语文,同时,他从伦敦博物院找到一本简略的中文“新约”,每天认真抄写,以提高中文水平,这本残缺的“新约”成了他日后翻译圣经的蓝本。1805年,伦敦传道会决定选派他到中国传教。次年,他到达印度加尔各答,他原想搭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前来中国,可是由于中国严禁传教士进入内地,东印度公司害怕触犯中国禁令影响商务,不允许马礼逊乘坐他们的商船。马礼逊只好绕道先到美国,再从美国搭乘商船到中国来。于1807年9月7日到达广东。他根据教会批指示,先找个立足之地定居下来,教授英语或数学,学习中文,编字典,译圣经,然后伺机开展传教活动。但是不久以后,躲在美国商馆里的马礼逊发现,他在广州根本无法活动,便于1808年转赴澳门定居。当时澳门是天主教的基地,不允许新教派前来争地盘,马礼逊为了避免矛盾,也不敢公开亮出新教派传教士身份。他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澳门的机构谋职,担任公司翻译,以合法身份从事活动。

同天主教耶稣会士一样,新教教士马礼逊在中国传布天主福音的同时,也为中西文化交流做了几件很有意义的事。马礼逊很重视开办教会学校,曾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英

华书院,在他的推动下,一些教友先后在广州和澳门办学。澳门的马礼逊学堂便是跟据他的遗愿创办。这所新学堂公开招生,无论是否教徒均可入学。开办以后,学堂为西学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近代著名改良派人士容闳赴美留学以前,曾于1841年起在该学堂读了六年书,受到了良好的西学教育。

3. 早期中国人的出洋留学

澳门教区还有意识地在中国传教士中选拔人员,派遣出国深造。这项工作一方面由圣保禄学院从学员中挑选,另方面由传教士在各省挑选,推荐至澳门教会,再启程赴欧,一般来说,中国学生留洋是从17世纪中叶开始的。到了18世纪,被选派留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1732年传教士马国贤回意大利后,在那不勒斯创办了一所直属罗马教廷的中国学院,该学院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远东传教人才。学院不仅接纳中国留学生,凡有志来远东传教的西人或土耳其人,均可入学修读,学院至1868年停办。当时留学人员多数在中国学院就读,但也有在法国和葡萄牙等国。由于年代久远,人员分散多国,因此人数难以准确统计,但据方豪先生指出,仅意大利的中国学院一处,在其办学136年间,先后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便达106名,以当时的形势而论,这个数字已相当可观了。

郑玛诺是中国第一个留洋学生,号惟信,祖籍广东香山县,1633年生于澳门,1645年12岁时,被澳门教区选中,随同陆德神父赴罗马深造。他从澳门乘船出发,经马六甲、爪哇、果阿、波斯、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等地前往欧洲。途中遍历艰险,屡遭拘禁,费时5年才抵达罗马。随即进入耶稣会举办的圣安德勒学院修读。1653年郑玛诺正式加入耶稣会,又转入罗马公学学习,攻读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和外语等课程。毕业后居留罗马,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与文学。三年后转赴欧洲各地学校任教。至1671年返回澳门。这时他已38岁。同年他应召入北京朝廷供职。但他已身患严重肺病,而于1673年5月26日病逝。郑玛诺游学欧洲26年,经历丰富,知识渊博,是个西学素养较高的学者,回国时正值康熙皇帝广纳贤才之际,可惜他英年早逝,未及施展所学,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应有贡献^①。

早期中国人出三年留学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留学均由教会组织,学员由传教士在教徒中选拔,派送国外留学的目的是培养华人传教士;第二,被选拔出国的留学的人员多数是12岁左右的教童,即由虔诚的教徒自愿把资质聪颖的子弟交付教士送出国外培养,以便为扩大天主教的传教效劳。但客观上不可避免地由此产生出一批西学人才。尽管如此,当时出洋留学在中国社会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与鸦片战争后所掀起的留学热潮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史籍甚少记载,天主教会也没有大肆宣传,故鲜为人知。这些留学人虽然是为天主教会的需要培养的,但偶而也参加外交活动,据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说,1792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华时,因找不到合格的翻译官,焦急万分,便派人到欧洲各国求助。几经周折,终于查访到意大利那不勒斯有一所中国学院,里面有不少中国留学生,便从中选出卓保罗与李雅谷(又名柏俞白)二人,担任使团翻译,这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马戛尔尼才松了一口气。

^① 其他留学生情况可参看方豪:《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第一辑(独立出版社,1944年),页120~130。

4. 西洋典籍的传人与《中国丛报》的创办

澳门教区奉行的学术传教方针,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促使大量西洋文化典籍流入中国。早在天主教在华开教之初,利马窦等人为了与人谈论学问的需要,总是随身携带一些书籍供参考之用,并在中国教徒协助之下,把这些书译成中文出版。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遂传入了中国,同时也扩大了天主教的影响。

1610年利马窦去世后,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前往罗马参见教皇,报告了中国传教的情况,教皇保禄五世对利马窦等人学术传教所取得的开拓性成就感到十分高兴,其后金尼阁以教皇的名义到处募集图书,共达七千部之多,由教廷加盖印章,作为教皇赠书供远东教区传教之用,教皇授意向一个教区赠书如此之多,在天主教史上是罕见的。它充分说明当时罗马教廷对开辟远东教区的高度重视。1618年金尼阁与傅泛际,以及其他22名教士携带这些教皇赠书离开意大利,于1620年7月22日抵达澳门。

关于金尼阁等人携书来澳门一事,杨廷筠于1621年所著《代疑篇》曾有记载,他说:“自西泰利先生(即利马窦)用宾上国,蒙朝廷生养死葬,其国主感恩图报,特遣陪臣金尼阁远来修贡,除方物外,有装璜图书七千余部,重复者不入,纤细者不入。书籍见顿香山澳,俾一朝得献朝廷,当必发仪部及词林,与西来诸儒翻译讎订,书义昭然,兹编亦属剩语矣。”《代疑篇》写于七千部图书的运到澳门之后一年,其叙述翔实可靠,自不待言。其后两年,杨廷筠为艾儒略《西学凡》一书写序时,再次提及七千部图书的事。他认为这些从西方运来的典籍,其来路之遥远,数量之多,意义之大,远远超过玄奘西天取来的经书。我们不一定同意他的观点,但他把“西天取经”与“西洋送经”相提并论,说明他已认识到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当时提到七千部图书还有其他人,例如与徐光启齐名的天主教信徒李之藻就是一个。他在1623年为艾儒略《职方外记》一书作序时写道:“金子者(指金尼阁)斋彼国书籍七千余部,欲贡之兰台麟屋,以参会东西圣贤之学术者也。”

七千部典籍并非纯宗教图书,也有许多科学著作,如西人邓玉函与华人王徽合译的《远西奇器图说》三卷,便是七千部中之一,属于物理类,不过究竟七千部中宗教类与非宗教类图书各占多少比例,就不得而知了。

西洋典籍的传人,引起中国士大夫的浓烈兴趣,阅读与翻译典籍成为晚明一时风尚,1639年李九功在《励修一鉴》序言中说,七千部图书已有一百多种译成了中文出版,平均每年约出版五六种。进入清代,耶稣会及其门人仍在陆续从事译书工作,不过到了康熙年间,朝廷下令禁止天主教,但译书工作直至乾隆时才陷于停顿。以后再也没有人提及之批图书了。据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译著提要》一书所载,共译著达211种,其中涉及西洋科技类的共35种(历算类16种,科学类19种)。

七千部西洋典籍后来究竟流落到那里去了?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看来它们的去向不外几种可能:(一)保存在澳门的圣保禄学院和教堂中。如果是这样,则会因1835年的火灾而全部化为灰烬了。(二)由于中国禁止天主教,而被传教士运回西方或亚洲其他教区去使用。(三)在天主教被禁前,已由传教士陆续携带至北京,献给朝廷或存放于北京天主教堂。(四)由教士携入内地,分赠给教徒,或散落于内地的教堂。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一书的编后记中,曾提及这七千部典籍的下落。明清之际

天主教耶稣会士先后在北京建造三座天主教堂,即南堂、东堂和北堂,在“学术传教”的指导思想下,三堂均设立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其中,南堂图书馆是1601年利马窦抵京后创办的,它藏有利马窦携来之科学和宗教书籍。东堂创立于1650年,它是耶稣会士著书立说的住所,利类思、安文思曾在这里居住,译印了圣多玛斯之超性学要,以及弥撒经典《司铎四课》、《七圣事礼典》、《司铎典安》等书。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任钦天监工正时,曾率领200多名钦天监的职员居住东堂,编译历法书籍。当时汤若望的个人藏书有300多本。北堂图书馆是法国耶稣会士于1700年建立的,藏有法国国王所赠送的珍贵书籍。法籍耶稣会士颇能潜心于研究中国文化,极力加以颂扬并向欧洲传入。同时,法国人又与欧洲各国学术机关建立密切联系,交换讯息,互赠书籍,因此被称为学术的府库。据徐宗泽说,金尼阁于1618年从欧洲携带来华的七千部图书,也收藏在南堂图书馆。但他没有说明这个消息的来源。其后1773年7月21日,罗马教皇下令解散耶稣会,中国的耶稣会亦于1775年被解散。1782年味增爵会士受命接管耶稣会士在中国所办的教堂,这样北京的三堂便由味增爵会会士管辖。当时中国政府严禁天主教,1812年,味增爵会会士福文高、高宋谦等见官府屡来查抄,便想转移教堂的贵重物品和图书,不慎发生火灾,图书等全被焚毁。从此只剩下南北二堂。1826年主管北堂的高守谦被调回欧洲。次年清政府遂将该堂充公。该堂的留守人员把图书迁移至教士墓地正福寺和西湾子等处收藏。正福寺的保管人员害怕官府搜查,便将书籍包装掘土埋藏,六年后发掘,只见书籍已化为泥土了。至于保存在西湾子之图书则完好无损。南堂图书馆的图书,毕学源主教已于1833年,托付俄国东正教的魏主教保管。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天主教解禁,俄国东正教堂把保管的图书璧还原主,计有5400册之多。这些书籍被移置于北堂图书馆^①。至1938年,人们清理北堂图书馆的藏书时,发现有数百册图书装帧规格统一,皮制封面,书的上方分别盖上了教皇保禄五世御玺和耶稣会徽章,这证明七千部至少有一部分确实运到了北京,至于其余的西洋典籍的下落,迄今还是一个谜。

19世纪初马礼逊创办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是外国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英文杂志。它作为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术园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831年底,马礼逊得到美国教会机构赞助的印刷机,便邀约裨治文、卫三畏等传教士共同创办《中国丛报》,于1832年5月正式出版。该报创办至1851年停刊这20年间,出版地学三度迁移(广州—澳门—香港),其中在澳门出版的时间长达8年(1836年~1844年),“丛报”为月刊,每期24开本,约50多页,由于是英文版,其主要读者对象为外国人,即来华的传教士与商人,乃至军政官员,根据现在出版的《丛报》合订本(影印本)的总索引统计,20年间,共发表文章1378篇,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 中国国情类,包括:中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与工艺等,共514篇。
2. 中外关系类,包括:中外贸易、鸦片问题、中英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与欧洲、亚洲其它国家关系等等,共396篇。
3. 外国类,包括:日本、朝鲜、越南与印支各国,南洋群岛等,共142篇。

^① 参见《公教学志》(天津工学院),第4卷第2~3期,又见徐宗泽:同前引书,页479~481。

4. 宗教类及其它,共326篇。

总之,中国与有关中国有关的文章约占90%,称为《中国丛报》,可谓名符其实。

《中国丛报》是政治性强,学术质量较高的期刊,它所发表的文章一般为几千字以上的长文,撰稿人是在华生活多年的“中国通”,写作态度也十分认真,均能抱有探讨问题的态度,阅读大量中国书籍,广泛引证资料,或者根据本人亲身经历的见闻,实地调查的资料,写出来的文章言必有据,史料翔实。他们评介的摘要转载130多种外人有关中国的著述,还把88种中国史籍摘译成英文刊载。《中国丛报》合计本20厚册,估计字数达1000万字。这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文献财富,是富有研究价值的珍贵史料,它是当时来华贸易的商人、传教士,乃至军政人员必读的教科书,这些人士可以从中了解中国的国情,学会如何在中国传教和做生意,如何同中国人打交道,由于《中国丛报》较长时间在澳门出版,它所刊载的有关澳门方面的研究资料也十分可观,弥足珍贵。

马礼逊在华的文化活动方面的业绩受到英国政府的赏识,于1834年被任命为英国商务监督秘书兼翻译,这意味着他将从普通的传教士变成一名驻华官员,他为这次荣升感到兴奋不已,表示决心:“在所担任的新岗位上忠于我的上主。”但是他就任新职仅一个月,便由于过度兴奋和辛劳,而于当年8月12日在澳门病故,享年仅52岁。死后埋葬于澳门公墓,他的生前好友为他立一块碑,碑文称他是“万世不朽之人”,对他赞扬备至,碑文中有一段话写道:“当其于壮年来中国时,勤学力行,以致中国之言语文字,无不精通。迨学成之日,又以所得于已者作为《华英字典》等书,使后之习华文汉语者,皆得借为津梁,力半功倍。故英人仰慕其学不厌,教不倦之心,悉颂为英国贤士。”

5. 澳门西洋火炮在中国的推广

葡人居留澳门后,在当地设立枪炮铸造厂,所生产的枪炮主要用于葡人防卫澳门和商船的安全。但深知葡人“鸟铳颇精,大铳颇雄”^①的广东官员,有时亦征用其军舰助剿海盗。80年代利马窦入内地传教时,极力向徐光启、李之藻宣传西洋枪炮的威力,大大促进了西洋枪炮再次向中国推广使用。据李之藻向朝廷报告说,“臣尝询以彼国武备,通国无养兵之费,名城大都最要害处,只列大铳数门,放铳数人,守铳数百人而止”^②。1618年徐光启奉命练兵抗击女真,他与李之藻、杨廷筑等商议,决定引进西洋火炮御敌。1620年10月,徐光启、李之藻派张焘、孙学诗前往澳门购买西洋火炮,招募炮手。澳葡为了讨好明朝,募捐筹款,购买火炮4门,选派4名有经验的炮手,将大炮送至广州,后来又转送至江西的广信^③。1621年徐光启再派张焘、孙学诗至澳门买炮30门,招募葡炮手百人。但是徐光启的政敌沈樞极力反对,明朝政府只同意购买火炮,不批准招募百名葡兵。1622年从澳门招聘到达北京的葡人仅有“夷目七人,通事一人,兼伴十六人。”这名通事就是教士陆若汉(Johannes Redriquez)。后来北京一次实弹演习中,火炮发生故障,炸裂炮身,造成葡人教练和中国士兵的严重伤亡。明朝被迫暂时放弃使用洋炮的计划,葡人教练返回澳门,徐光启因此事故于1625年被撤职。

① 俞大猷:《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正气堂集》(明嘉靖8年刻本),卷15。

② 李之藻:《为制胜务项西统乞敕速取疏》,《徐文定公集》,卷3。

③ 魏诗:《汤若望传》,第一册,页82。

1628年崇祯皇帝即位,次年重新起用徐光启为礼部侍郎,他重新推广使用澳门西洋大炮,再次向葡人购买火炮,招募葡兵,由两广军门李逢节、王尊德前往澳门购买了火铳10门。葡人派公沙提西劳(Consales Teceira)带领炮手和工匠伯多禄、金答等进京,在涿州一带布防,参加北京保卫战。崇祯很重视这些西洋火炮的作用,赐名为“神威大炮。”1630年,徐光启又派中书姜云龙、教士陆若汉到澳门购买大炮,聘请澳葡炮手300名进京。但是葡人乘机提出种种非份要求,以相要挟,其中包括:要求撤去香山参将和驻军,葡船不受盘查,不受禁阻,免除每年租税银一万两,每名应募葡兵安家费银300两,以及“必筑复城台,而后300人始肯应调。”由于香山人礼部给事中卢光龙极力反对,引起明朝政府疑虑。姜云龙被革职回家,已招募的300名葡萄牙炮手工匠便由江西遣回澳门^①。改由徐光启推广仿制西洋火炮,从1629年至1632年,福建、广东、云南、山西各省均制造大炮进献。

虽然招募葡兵进京的计划,因卢兆龙的反对而中止,但地方大吏仍有人主张使用葡兵参战。1630年6月,孙元化任登莱巡抚,为了增强部队的作战力量,便通过教士陆若汉、公沙提西劳等人,把一批葡萄牙造铳工匠和炮兵教官征调来登州,铸造了20多门征夷大炮,30多门西洋炮。1633年孙元化的部属背叛明朝,使登州陷落,所有西洋枪炮落入清军之手,登州战役中,葡人炮队统领公沙提西劳,副统领鲁未略等12名西洋人以身殉职。陆若汉与其他15名葡人幸免于难。

清军后来掌握了仿造西洋大炮的技术,用以同明军作战。1631年10月的辽西之战中,清军首次用红衣大炮击败明军于子章部队。而朝朝为了挽救败局,仍在澳门教区教士的协助下铸造大炮,1636年,教士汤若望在皇宫旁设立铸炮厂,两年之内铸炮20门。1640年明朝政府以其督造战炮有功,予以嘉奖。

清军入关后,南明诸王仍与澳门葡人联络购买西洋大炮抵抗清军,如唐王曾派教士毕方济与庞天寿到澳门购炮,但不久唐王政权即被清军击改。于是庞天寿把所购得之大炮转献给肇庆桂王。1648年,澳门葡人又赠送桂王100枝火枪,并派葡兵300支援桂林防务。

明清之际的战争验证了西洋火炮的威力,并在澳门葡人协助下,中国人逐步掌握了铸造与使用火炮的技术,于是西洋火炮在清代得以逐渐推广开来。

(黄鸿钊: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编辑刘逊

^① 《崇祯长编》,卷34、35。

交河郡夫人墓·高昌·吐鲁番

——兼述高昌与中原的关系

孙 永 乐

1973年8月,在甘肃省榆中县城西4公里、陇右名胜兴隆山北2公里的朱家湾村外,发现了一处石棺墓。墓室穹顶,高3米,长、宽各4米,为 $35 \times 16.5 \times 6.5$ (厘米)青砖砌成。石棺首南足北,置墓室西侧,长、宽、高各为235、108、121厘米,其底厚20厘米、盖厚11厘米、帮厚12厘米,以铁榫栓之。石棺内有朽木及黑漆残片,可能是木质内棺遗物。石棺四面均有四神纹浮雕,前为朱雀造型,30厘米大小,雀首向左,左翅前展,右翅贴身;右为四足矫龙,一足前扑、三足踏云,龙口吐水,龙尾弯曲向后,首尾共长147厘米,高43厘米,背鳍如齿,形象生动;左为巨虎,耳贴于后,身长90厘米,高40厘米,尾长47厘米,尾径4厘米,四足呈奔走状;后端为兽头,近似圆形,约32厘米大小,巨口排牙、突目大耳,与俗传“玄武”不同。四神纹中,左青龙、右白虎则棺主为男性,反之则为女性,故此棺殓女性。1990年秋,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先生来榆考查,对此棺雕刻赞誉不已,称为唐代浮雕的典型杰作。此墓早期被盗,1973年清理时发现石棺后端被砸开一洞,尸骨弃于棺外,头颅骨完全,牙齿整齐,墓主似为中年死亡。墓室中部留有马骨及马鞍残块、饰件铜环两个,羊骨两具,狗骨一具。淤泥中还发现镶嵌绿宝石粗金戒指一枚,直径2.5厘米圆形饰龙金牌一个,8厘米长小刀两把。极为珍贵的是在墓室北端发现青石板镌刻墓志铭残块数片,得残文(21行)如下:

故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序

夫人讳仪字辅贤昌黎人也其先□汗青海图□□超 皇任骠骑大将军赠持节都督夫人
□□□□也室由天火崇女德于宗盟出奉□□□□□□配德和鸣内范嫔妒冰操礼
义盛族贵裔荣造□□肤气引银河之媛用能温肃恭懿宣慈惠和孝□□素柔而贞令淑远
闻嘉声克著虽寝疾移晷□□□弥留亦闺训不殚□将衰也感开宗子训及来系□贵而能
负无□□□人无怙富而卑上及其□□□□□□□短长□也生死命焉言毕遂终
□□□八月一日薨于金城郡私第嗣子朝议郎守太仆卿荣国公□吾卫大将军嵩等知生
也有涯死而无□流□□□天诃 慈亲之不待泊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此郡东南
九十里薄寒山之北原也粤□□□□□也死葬之以礼归于义终也犹恐墓墓□□□□□
穴内极二三子念曰然则何以纪德刻其□□□□成风观□□□微□□溪谷
□□□□□□□□不朽矣其铭 □ □□荣兮死而可哀 □□远感□□□□ □□
家兮寒霜朝催 □□美此□□□□ □□人兮垂裕后来 □□□□□□□□……
铭文书体凝厚端庄,楷兼隶意,颇具汉魏风骨。市、县博物馆请专家依据石棺浮雕、铭

文书体,初步鉴定为唐墓。笔者在编纂《榆中县志》文化篇的时候,经查证资料与麹氏高昌及吐鲁番出土文书资料联系起来,现不揣浅陋,将上述铭文试作解评。

二

上列墓志铭题头“故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序”,标明墓主生前身份是交河郡王的妻子。查交河郡,晋代所设^①,前凉所扩^②,麹氏高昌国也在同地设郡,并以交河城为郡。唐灭高昌后改置交河县,设安西都护府。古城自西汉至后魏,车师前王国皆都于此。故地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约5公里处的雅儿湖村之西^③。武周天授初(690年),归唐的末代高昌王麹智盛之侄麹崇裕被“授左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④。可知夫人为麹崇裕之妻,而麹崇裕为麹氏高昌第一代国王麹嘉的第十代后裔。据《魏书》、《隋书》的高昌传记述,“麹嘉,字灵风,金城榆中人”,墓志中有“薨于金城郡私第”、葬于“此郡东南九十里薄寒山之北原”的话,这就说明交河郡夫人是葬在麹氏故乡了。慕容是复姓,出鲜卑族。序文中说,夫人单名叫仪,字辅贤。有名有字,说明是一位有文化素养的贵族妇女。其故籍昌黎在今辽宁义县一带,是鲜卑族的发祥地。其先祖慕容超,曾任骠骑大将军,徙青海[图]、甘肃张掖一带。《晋书》的《载记》第28说:“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纳之子”,慕容纳曾任前秦广武太守,去官后家于张掖。后来劫余幸存的慕容超找见当南燕主的叔父慕容德,亦封北海王、拜侍中骠骑大将军,后又为太子、嗣王位,是个青年有为的小国之君,墓志标榜慕容家族这位始祖是有道理的。墓志序对慕容氏给予高度赞誉。“室由天火”的“室”指家庭,“天火”当为《易·同人》卦,上卦为乾即天、下卦为离即火,是讲一阴与五阳同在一卦时,一阴(六二)所起的和谐、凝聚作用。以下大意是:一个家庭就如同人卦一样,崇尚女德对于宗族团结大有裨益,而夫人奉嫁之后的品德正是这样的,优美的行与高尚的德互相配合、谐和、共鸣,于内是嫔妇的典范,志洁如冰,充分发扬了圣人礼仪。夫人出身于大族贵胄、荣耀无比,仪容气质与天上银河美媛相接相用,一方面有内在的温顺、严肃、谦恭、娴懿之品格;另一方面又显示着慈祥、贤惠、平和、孝亲的美德。夫人素洁、柔驯而且纯贞,美好贤淑的声名在遥远的地方传闻,赞誉人人皆知,即使在疾病卧床延移时光、临终弥留之际,仍不停地对家人进行闺范之训,要晚辈们注意在家运将衰的时候,牢记和发扬祖先功德,勉励子孙光大先人业绩,谆谆告诫:地位尊贵要能正确对待,绝不可盛气凌人,也不能凭富有而媚于上轻于下。每个人的寿数各有长短,生死都是命定的啊!言毕遂终。即在××年八月一日薨于金城郡家宅。孝子朝议郎守太仆卿荣国公、左武卫大将军麹嵩等人深深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您死了我们就失去依靠了,你的死会流芳百世,苍天也为之惊讶。慈爱的母亲呀,我们再也不能让您久等了,定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把你的灵柩送到这个郡(金城)东南九十里薄寒山的北原安葬。铭文接着是程序性的议论赞辞,大意是:后人对慈亲应克尽孝道,死了要葬之以礼、归之于义,这样还恐怕当子女的每晚会为慈亲寂寞穴内而忧愁。二三子都说,

① 《魏书》,卷101,列传89,高昌“汉西域长史、戊己校尉并居于此,晋以其地为高昌郡。”

② 《晋书》,卷97,列传第88,“前凉扩为高昌郡。”

③ 《辞海》,交河城辞条。

④ 《旧唐书》,列传第148,西戎·高昌。